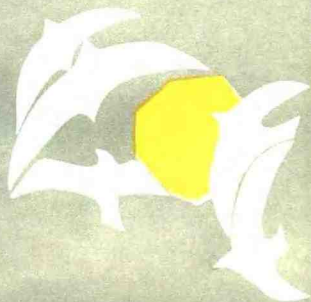


给小孩子的 大文学

刘崇善著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07.8

尾花：王安江、刘梅

给小孩子的大文学

刘崇善

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郑州晚报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4.875印张 161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册

统一书号10302·28

定价0.38元

目 录

鲁迅与儿童文学·····	(1)
郭沫若与儿童文学·····	(12)
茅盾与儿童文学·····	(20)
新鲜·亲切·多样·有趣·····	(32)
儿童诗的想象和构思·····	(37)
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	(45)
从《林中篝火》看时代特征·····	(51)
儿童小说的心理描写·····	(55)
漫谈儿童故事的创作·····	(65)
给小孩子的大文学·····	(69)
第一位的工作·····	(72)
为“童心”说几句话·····	(74)
真正为儿童的文学·····	(77)

孩子们喜爱什么·····	(80)
兴味和口味·····	(82)
儿童文学需要幻想·····	(85)
儿童特点和儿童化·····	(88)
写什么和怎么写·····	(91)
严肃和幽默·····	(94)
抒儿童之情, 写儿童之趣·····	(98)
童话和诗·····	(104)
儿童和儿童诗·····	(107)
从《“小兵”的故事》谈起·····	(110)
巴金的童话创作·····	(113)
金近的讽刺诗·····	(120)
雷抒雁的抒情诗·····	(126)
季振邦的朗诵诗·····	(128)
拉封丹的寓言诗·····	(131)
吕远的《小冬木》·····	(134)
肖然山的童话·····	(143)
杨羽仪的《画家和他的模特儿》·····	(145)
杨啸的《吹鹿哨的孩子》·····	(147)

鲁迅与儿童文学

“真正的爱国者……不但关心祖国和本国人民的现在，而且也关心他们的未来，因此也就是关心儿童，关心他们的教育，关心他们的意识和理想的形成。”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黑暗的统治时代，时刻关心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尤其关心祖国的未来——在成长中的年青一代。他曾不断地呼吁，要全社会都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在他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记》中，就听到他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响亮号召。而在他的一生中，在他与敌人斗争的艰难的年代里，始终关心少年儿童。他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抨击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积极地保卫儿童，使他们不受“精神的屠杀”，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鲁迅不仅关心儿童教育，而且也极其关心儿童文学，他知道这对形成儿童的意识、性格和理想起着巨大的作用。虽然鲁迅并没有直接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但是，他的杂文和译著是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贡献，它标志着鲁迅为建设儿童文学作了不懈的努力。

—

在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儿童并不受社会的重视。相反地，儿童也象成年人一样受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他们的遭遇是很悲惨的。鲁迅的杂文曾揭露了很多活生生的事实，替那些被压抑、被摧残的儿童发出反抗的呼声，为保卫儿童而

进行斗争。由于儿童得不到重视，“将他们看作一个蠢才，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因此，社会上也很忽视儿童教育。众所周知，在俄国沙皇时代，教育事业被认为“和捕捉野狗、运出垃圾及其他‘整顿市容’的差事差不多”。旧中国也是一样，“因为时势所趋，只得施一点所谓教育，也以为只要付给蠢才去教就足够。于是他们长大起来，就真的成了蠢才……”当时鲁迅象高尔基一样积极地为儿童的教育问题，为儿童能得到良好教育的权利而进行了斗争。

鲁迅特别关心劳动人民的孩子受教育的问题。由于当时劳动人民处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子女就很难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当鲁迅翻译《小彼得》的时候，更使他感触到这一点。因为《小彼得》是作者写给劳动者的孩子们看的，自然，鲁迅翻译它也必然会想到中国劳动者的孩子们，正如鲁迅在“序言”里所说的，他们“轮不到受教育，不能认识这四方形的字和格子布模样的文章，所以在他们和这是毫无关系，且不说他们的无钱买书和无暇读书”，鲁迅希望改变他们这种处境，并为此作了很大的努力。

教育对于儿童的意识，性格和理想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决定人的品质。鲁迅关心儿童教育，一方面，为争取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进行了斗争，另一方面，抨击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方法。鲁迅指出，“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方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思虑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

“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不仅家庭如此，当时，“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子称之为‘洋气’”。这样教育的结果，儿童不仅失掉了活泼、天真，甚至变得愚昧落后，象木偶、古董一样。鲁迅的杂文正有力地抨击了中国历代相传面当时还在实施的儿童教育。

教科书是儿童接受教育的主要工具，它的内容特别引起鲁迅的注意。由于社会上“经济的凋敝，使出版界不肯印行大部的学术文艺书籍，不是教科书，便是儿童书，黄河决口似的向孩子们滚过来”。这样，鲁迅就更感到应该审慎地阅读这些书籍，不能让有毒素的东西影响儿童。当时的儿童教育是很难令人满意的，私塾里也还有《三字经》和《百家姓》，鲁迅曾指责说，“在近三十年中，真不知变化了多少，忽而这么说，忽而那么说，今天是这样的宗旨，明天又是那样的主张，不加‘教育’则已，一加‘教育’就从学校里造成了许多矛盾冲突的人，而且因为旧的社会关系，一面也还是‘混沌初开，乾坤始奠’的老古董”。他曾看到一本1932年11月印行的“国难后第六版”的《看图识字》，这本书原来是“光绪三十四年”初版，离“国难后第六版”相隔27年。这些书不仅色彩恶浊，图画死板，而且，它的内容和实际生活几乎完全不同了，试问这些书能给儿童一些什么呢？鲁迅痛斥这是“变本加厉的愚弄孩子”。鲁迅还注意到这样一件事：童话作家爱罗先珂曾对鲁迅说，他害怕将来有人发明

一种方法，能使人们都成为打仗的机器。鲁迅说，“其实这方法早经发明了，不过较为烦难，不能‘怎么一来’就完事。我们只要看外国为儿童而作的书籍，玩具，常常以指教武器为大宗，就知道这正是制造打仗机器的设备，制造是必须从天真烂漫的孩子们入手的”。鲁迅看到资本主义社会迫害儿童的特殊方法，他站在保卫儿童的立场上，为使儿童不受精神的虐杀，始终担负着“救救孩子”的光荣任务。

当时的教育既是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儿童文学担负着教育的任务，它的内容必然与教育的要求相一致，因此，儿童文学也散布着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在《申报》的“儿童专刊”上刊载的《武训先生》，就是最明显的一例。这篇文章要儿童学习武训，象他一样做个卑颜屈膝的奴才，等长大以后好为统治阶级服务。鲁迅虽在病中，却不肯轻易地放过，他看了这篇文章，非常愤激，随即写了一篇《难答的问题》，批评了《武训先生》所宣扬的奴化教育的思想。不仅如此，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儿童专刊”又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作宣传，企图毒害儿童的心灵，麻痹儿童的思想意识。在《小学生应有的认识》中，公然给儿童增进这样的“知识”，那就是“以个人的私忿，而杀害外侨，这比较杀害自国人民，罪加一等”。对这种无耻的论调，鲁迅给以严厉的斥责，并且还愤慨地说“真的要‘救救孩子’。这‘与我们民族前途的关系是极大的！’而这也是关于我们的子孙。大朋友，我们既然生着人头，努力来说人话吧”！

鲁迅关心儿童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当他看到很少有人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马上指出，“先前的人，只知道

‘为儿孙作马牛’，固然是错误的，但只顾现在，不想将来，‘任儿孙作马牛’，却不能不说是一个更大的错误”。他关心儿童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当他看到那些有害的读物侵蚀儿童心灵的时候，他就一方面写杂文予以抨击，另一方面却不断地提醒人们，“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造成什么东西呢？却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同时，他还着重指出：“……打掉毒害小儿的药饵，打掉陷没将来的阴谋；这才是人的战士的任务。”鲁迅意识到儿童是祖国的“将来”，他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由于“教育就是教人革命化”（高尔基），所以，鲁迅才特别重视儿童教育。正因为鲁迅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因此，必然要求教育和培养新人的任务结合在一起。鲁迅之所以极力地抨击当时的儿童教育，正是由于它不能担负培养新人的任务，是和鲁迅所持的正确的教育思想相抵触的。

二

1919年，鲁迅在他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就把改造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同时，他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一直关心少年儿童，关心他们的教育，也关心他们的精神食粮。鲁迅感到要使他们能完成改造社会的重大使命，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新人，必须以新的教育方法去教育他们，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去影响他们。

真正优秀的儿童读物，在当时还是很缺乏的。“十来年

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但此后并无脱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拼命的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里的故事的白话译文。这些故事的出世的时候，岂但儿童们的父母还没有出世呢，连高祖父母也没有出世，那么，那‘有益’和‘有味’之处，也就可想而知了”。鲁迅非常渴望有新的儿童文学作品创作出来，同时他亲自为儿童翻译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在儿童文学翻译方面，鲁迅曾经作了很大的贡献。在1922年，鲁迅就辑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以及爱罗先珂的三幕童话剧《桃色的云》。一般地说，这些作品较深了一些，儿童不容易看懂，但在当时，我国的儿童读物都靠翻译或改写欧美的儿童文学作品，鲁迅翻译这位俄国盲诗人的作品，突破了这一狭隘的范围，确有一定的意义。不仅如此，爱罗先珂的童话是以一颗童心来描绘自然的，在风格上也是比较清新的。1927年，鲁迅又翻译了荷兰的古典童话《小约翰》。这篇童话的特点，正如鲁迅在“引言”中所说的，“其中如金虫的生平，菌类的言行，火萤的理想，蚂蚁的平和论，都是实际和幻想的混合”。这和当时一般童话里所存在的脱离现实的幻想，是根本不相同的。儿童阅读童话可以丰富他们的想象力，但是，如果童话里全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不仅不能丰富儿童的想象力，而且会使他们的思想混乱。《小约翰》所起的积极作用，正是它能丰富和发展儿童的想象力，并且排斥了有害的幻想戕害儿童。1929年，鲁迅

还翻译了匈牙利女作家，被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作家”至尔·妙伦的《小彼得》。鲁迅认为这部作品和后来翻译的班台莱耶夫的《表》是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因为“《小彼得》是一本以自发儿童阶级觉悟的有趣的童话，使少年儿童们深刻认识苦难的工人的生活，并且以集体斗争的道路鼓舞少年的反抗精神”。

1935年，鲁迅第一个将优秀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他翻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表》。他在《表》的“译者的话”中写道：“在开译之前，自己确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的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10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表》确实起了巨大的影响，它成为儿童最喜爱的读物之一，直到今天，在对年青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中，它仍有很大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由于受这部作品的影响，使我国的作家们创作了一些新颖的儿童文学作品，而《表》又被作家们改编为儿童剧，最后拍摄成电影，在全国范围内起了良好的影响。鲁迅翻译这部作品，说明他已注意以社会主义的儿童文学作品来影响儿童，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鲁迅不仅自己翻译《表》给孩子们看，而且，他还介绍孩子们去看其他人翻译的苏联儿童文学作品。在《鲁迅书简》“给颜黎民的信”中，鲁迅就曾向他介绍了杰出的苏联儿童作家盖达尔的小说《远方》。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天空，他想潜入蚁穴……所以给儿童看的书必须十分慎

重，做起来也十分烦难”。鲁迅自己在给孩子们翻译作品的过程中，就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关于翻译，鲁迅一贯主张直译，但是，对于儿童文学的翻译，他却要求童译甚至于改译，这正说明鲁迅注意到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鲁迅说，“凡学习外国文学的，开手不久就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然而开手就翻译童话，却很有些不相宜的地方，因为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童译令读者看得费力”。在翻译《小约翰》的时候，由于动植物的名字很多，使鲁迅感到不少困难，对每一个译名，他都经过再三推敲，最后才确定下来。这样，他还怕儿童看不懂，以致不能接受它的内容，因此，又在书末附了一篇“动植物译名小记”。在翻译《表》的时候，也是这样，往往为了几个字，就推敲了很久。1935年3月22日，在他给徐懋庸的信上写着：“‘不够格’我记得是北方的通行话，但南方人不懂，‘弗入调’则北边人不懂的，在南边，恐怕也只有绍兴人深知其意，否则，是可以用的”。直到同年12月29日，在他给王野秋的信上，还提到这几个字。信上有这样一段话：“最难的是所谓‘不够格’我想了好久，终于想不出适译。这并不是‘不成器’或‘不成材料’，只是‘有所欠缺’的意思，犹言从知识到品行，都不及普通人——但教育起来，是可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丰富儿童的语言的主要工具，因此，给儿童看的书就应该特别注意语言。通过语言，不仅让儿童了解作品丰富的内容，而且，还要能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以达到一定的教育目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需要能朗朗上口、生动的、形象的、精练的语言。鲁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慎重地考虑语言问题，是值得今天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者学习的。在

我们某些作品中，仍不能很好地重视儿童语言，以致出现不合语法或艰涩的字句等现象。在运用语言进行创作时，必须象鲁迅所指示的那样，“第一是在作者先把似识非识的字放弃，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也就是学学孩子，只说些自己的确能懂的话”。

三

在鲁迅的日记里记载着：早在1913年，他在教育部工作时，就翻译过日本上野阳一的《儿童之好奇心》，刊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又据唐弢说：“知道而没有找到的，有《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译文一篇，见1914年11月27日鲁迅日记。”由此可见，很早以前，鲁迅就研究了儿童的心理，他了解儿童，知道儿童文学在形成他们的意识、性格和理想上所起的作用；他这样热心关怀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积极为建设崭新的儿童文学而斗争，并不是偶然的。鲁迅的这些杂文是奠定在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的，不仅是过去儿童文学评论的典范，而且，对今天儿童文学评论上仍有示范作用。鲁迅指出的儿童文学创作上存在的某些问题，迄今并未获得根本的解决。

鲁迅不满意人们愚弄孩子，他对那些给幼儿看的内容极端陈腐的《看图识字》，提出过尖锐的批评。鲁迅也不满意那些印给儿童看的画本，因为在那些画本中，“其中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然而画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带着横暴冥顽的韵味，甚而至于流氓模样的，过度的恶作剧的顽童，就是钩头耸背，低眉顺眼，一副死板的脸相的所谓“好孩子”。鲁迅反对把这些书“作为供应儿童仿效的范本”，因为这样只会

使儿童失去了原有的精神面貌，在他们的“世界中没有一丝乐趣”，正如鲁迅所说的，“孩子长大，不但失掉天真，还变得呆头呆脑，是我们时时看见的”。今天，从儿童故事《捉野兔》的争论中，正说明了“想把孩子培养成顺从听话、斯文规矩的这种陈腐的教育观点，在一部分教师、家长，甚至一部分儿童文学工作者中间，还有着相当顽固的地盘，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来妨碍孩子们性格中宝贵的特征的发展”。象《捉野兔》才稍微描写了儿童有趣的、带有一点冒险的行为，就被一些人所责难，也难怪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里的儿童形象，大都是一些服服贴贴、规规矩矩，实际上是毫无生气、毫无个性的“小大人”。不消除人们头脑中陈腐的教育观点的残余，不仅不能扩大儿童文学题材的范围，创作出受儿童欢迎的冒险、惊险、幻想的故事，而且，也很难完成培养新人的任务。鲁迅的杂文仍然是今天儿童文学批评的典范，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日前的儿童文学创作，仍然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同时，由于儿童对儿童读物的大量需要，一些儿童读物仍存在粗制滥造的现象。鲁迅在过去曾指出一些书籍，“那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要将我们的孩子造成什么东西呢？却没有看见战斗的批评家论及，似乎已经不大有人注意将来了”。今天的儿童文学批评也是很不够的。这就是说，批评家们还没能象鲁迅所指出的担负“人的战士的任务”，这不正好说明鲁迅的杂文对我们的儿童文学批评家们仍有很大的作用吗？鲁迅所提出的任务，难道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工作吗？鲁迅以身作则地担负了“人的战士的任务”，并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任务，这不仅对当时的许多批评家们有很大的影

响，而且，也应该成为今天批评家们仿效的范例。

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对儿童文学的深切关怀，正说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在当时，鲁迅指望他们担负改造社会的重大使命，现在的少年儿童，他们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必须“教育出这样的人：他能挽起袖口，把自己全部的力量和热情都献给建设共产主义的事业，他认为整个共产主义建设的成败完全系于交付与他个人的事业的成败”。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教育好年青一代的重大使命，了解到这件工作的革命意义，我们才会象鲁迅一样关心儿童教育，关心儿童文学，关心他们的意识，性格和理想的形成。在儿童文学上，鲁迅作了巨大的贡献，他为我国建设崭新的儿童文学而作了长期的努力，他为培养新人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劳动。我们必须发扬鲁迅这种精神，为儿童文学的发展与繁荣，为创造优秀的社会主义儿童文学作品而努力。



郭沫若与儿童文学

郭沫若和少年儿童

郭沫若同志是一位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不仅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和发展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始终关怀年青一代，为使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做了大量的工作。

郭沫若是少年儿童十分热爱的良师益友，他始终对少年儿童十分挚爱，并对他们抱有殷切的期望。1937年，党领导下的孩子剧团，在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冒着敌人的炮火，从上海到武汉，一路演剧、唱歌，宣传抗日救亡。郭沫若在武汉看了他们的演出，激动地流出热泪，鼓励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磨炼中成长起来”，预示“中国要跟着你们一道成长起来”。他把祖国的前途和孩子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表达了对战区儿童的关怀和期望。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他要孩子剧团的小演员们好好学习，安排教员教他们学政治，学时事，学专业知识。解放以后，根据郭沫若为孩子们写的诗《新中国的儿童》谱曲而成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号召少年儿童继承革命传统，“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为建设伟大的祖国，“走向光辉灿烂的明天”而奋斗。郭沫若对少年儿童的亲切嘱咐，随着这首歌响彻全国，荡漾在每个孩子的心头。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为少年儿童服务，郭沫若视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忽视了我们眼前的嫩苗！在那方生的力量中正具备着未来的无限的伟大。为少年儿童服务，也就是为祖国建设服务”。在郭沫若的一生中，不管工作如何繁忙，凡是少年儿童有求于他的事，或者是与少年儿童有关的事，包括题字题词、写诗作文、集会活动，他都尽力而为，甚至一次美术电影观摩和少年儿童科技、工艺作品展览，他都亲自去看，还要写诗作文加以赞扬和评论。1940年在重庆出版《抗战儿童》，他为该刊题字：一次搞儿童活动，请他写一首歌词，他也欣然答应。解放以后，郭沫若为天津人民出版社编选出版的《为孩子们写的诗》题了字，还为《少年诗歌选》、《科学家谈21世纪》两本书题词，告诫少年儿童不要骄傲自满，预祝他们在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据他自己记叙，《玉兰和红杏》这首诗，是“在大觉寺的玉兰树下，遇着一群红领巾。他们围上来，向我说：‘郭伯伯，你写首诗吧！’我便口占了这诗的开头四行”，两个月后写成的。195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孩子的诗，有一位小作者在诗里表达了向郭沫若学习写诗的愿望，郭沫若当即写了一篇《读了〈孩子的诗〉》，认为他们是会“超过我们这一代的诗人的”，并和了一首诗，即“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这早已传为文坛佳话，也充分表露了他和少年儿童亲密的关系。

“六·一”国际儿童节是少年儿童自己的节日。郭沫若希望“自己也是一个儿童”，“也能有资格来欢度这个节日”，他总是寻一切机会参加他们的活动，至少也要写诗作文向少